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主编◎曹顺庆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丛书

英语世界的 《易经》研究

李伟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主编◎曹顺庆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丛书

英语世界的 《易经》研究

李伟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 / 李伟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8750 - 0

I. ①英… II. ①李… III. ①《周易》 - 英语 - 翻译 - 研究 IV. ①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8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 75
插 页 2
字 数 422 千字
定 价 9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资助说明

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项目批准号：12BWW01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JZD016）和2013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的资助。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丛书 总序

本丛书是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12JZD016)的成果。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语言,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既是中国文学外传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文化在异域被接受的典范。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从学术价值层面来看,研究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首先,有利于拓展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考察中国文学在异域的传播,把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至英语世界,要求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不能局限于汉语及中华文化圈内,而应该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也纳入研究范围。同时还需要我们尊重文化差异,在以丰厚的本土资源为依托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异质文明的研究成果并为之展开平等对话,跨文明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显然是对汉语圈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视野与方法层面的突破。其次,对推进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过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情况的考察,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外文学关系的实证性与变异性,了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及中国文学对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还为我们思考世界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及如何建立层次更高、辐射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的世界诗学提供参考。

从现实意义层面来看,首先,开展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可为当下中国文学与文化建设的方向发展提供借鉴。通过研究中国文学对“他者”的影响,把握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及世界意义,在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既重视本土价值也需要考虑世界性维度,可为我国的文学与文化发展提

供重要启示。其次,还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通过探讨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及研究,发现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特点及接受规律,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影响,这对于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引导下,我组织一批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与文化的比较文学学者撰著了这套“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丛书,试图在充分占有一手文献资料的前提下,从总体上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进行爬梳,清晰呈现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大致脉络、主要特征与基本规律,并在跨文明视野中探讨隐藏于其中的理论立场、思想来源、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在研究策略上,采取史论结合、实证性与变异性结合、个案与通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在深入考察个案的同时,力图用翔实的资料与深入的剖析为学界提供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中国文学英译与研究学术史。

当然,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进行再研究并非易事,首先,得克服资料收集与整理这一困难。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资料繁多而零散,且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加之国内藏有量极为有限,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搜集,尤其要寻求国际学术资源的补充。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坚守基本的学术立场,即在跨文明对话中既要尊重差异,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寻求共识。此外,如何有效地将总结的特点与规律运用到当下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换,这无疑是更大的挑战。这套丛书是一个尝试,展示出比较文学学者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闯劲,也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创新的精神。

本套丛书是国内学界较为系统深入探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的实践,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这些研究大多突破了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原有模式,从跨文明角度审视中国文学,是对传统中国文学研究模式的突破,同时也将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纳入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范围,具有创新意义。此外,这些研究综合运用了比较文学、译介学等学科理论,尤其是我最近这些年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①,将英语世界中国文学

^① 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pringer, Heidelberg, 2013.

的译介与研究中的文化误读、文化变异、他国化等问题予以呈现，并揭示了其中所存在的文化话语、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一些优秀研究成果还充分体现了理论分析与现实关怀密切结合的特色，即在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还总结规律和经验为中国文化建设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较好地达成了我们从事本研究的初衷与目标。当然，由于时间仓促与水平所限，本丛书也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曹顺庆

2015 年孟夏于成都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原因、目的和学术价值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6)
第四节 本书内容说明及篇章结构设计	(18)
第一章 中西初识与《易经》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21)
第一节 中西初识	(23)
第二节 法国传教士与《易经》	(38)
第三节 白晋、莱布尼茨与《易经》	(47)
小结	(56)
第二章 《易经》英译的发轫期	
——从雷孝思到麦丽芝	(58)
第一节 雷孝思与《易经》	(58)
第二节 麦丽芝与《易经》英译	(67)
第三节 拉古贝里、哈雷兹、霍道生、晁德莅、艾约瑟与 《易经》	(76)
小结	(82)
第三章 以理雅各为代表的《易经》英译发展期	
——兼论卫礼贤—贝恩斯《易经》译本	(84)
第一节 理雅各与《易经》	(85)

第二节 卫礼贤—贝恩斯与《易经》	(147)
小结	(157)
 第四章 《易经》英译的成熟期	
——从 20 世纪中期到 21 世纪	(159)
第一节 蒲乐道与《易经》	(160)
第二节 孔理霭与《易经》	(167)
第三节 林理彰与《易经》	(178)
第四节 夏含夷与《易经》	(186)
第五节 “元亨利贞” 之内涵及其翻译	(193)
小结	(199)
 第五章 《易经》与英语文学	(206)
第一节 英语世界论《易经》与“言—象—意”	(206)
第二节 英语世界论《易经》与中国叙述结构之关系	(226)
第三节 《易经》在英语文学创作中的接受与变异	
——以罗森菲尔德《死与易经》为个案	(234)
小结	(269)
 结语	(271)
 附录一 《易经》西译表解（部分）	(278)
附录二 理雅各与卫礼贤翻译的《中国经典》对照表	(283)
附录三 国内外部分易学研究组织和机构	(285)
附录四 国内外易学研究刊物	(287)
附录五 易学书目	(288)
 参考文献	(390)
 后记	(401)

图表目录

图 1-1	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书影	(30)
图 1-2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封面书影	(33)
图 1-3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第 14 页书影	(33)
图 1-4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六十四卦图书影	(36)
图 1-5	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六十四卦图书影	(36)
图 1-6	柏应理等所译《中国哲学家孔子》封面及正文书影	(39)
图 1-7	刘应所译的法文本《易经》书影	(44)
图 1-8	莱布尼茨所见到的伏羲六十四卦图	(52)
图 1-9	莱布尼茨所见的伏羲八卦图考	(54)
图 2-1	雷孝思拉丁文《易经》译本书影	(62)
图 2-2	麦丽芝《易经》英译本扉页书影	(69)
图 2-3	麦丽芝《易经》英译本正文书影	(70)
图 2-4	麦丽芝所译《儒家的宇宙起源学说》译文正文书影	(70)
图 2-5	拉古贝里的《中国最古老之书——〈易经〉及其作者》 书影	(77)
图 2-6	霍道生发表于《基梅博物馆年刊》上的《易经》 书影	(80)
图 3-1	理雅各翻译的《易经》扉页书影	(86)
图 3-2	理雅各翻译的《易经》目录页书影	(121)
图 3-3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形成图	(133)
图 3-4	沈仲涛翻译的《易经》(中英对照) 书影	(142)

图 3-5	《初庵老人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	
	书影	(157)
图 4-1	孔理霭研究并翻译《易经》时的笔记手稿影印件	(170)
图 4-2	孔理霭所译《易经·乾卦》书影	(176)
图 4-3	利策玛英译《易经》封面书影	(202)
图 4-4	裴松梅英译《易经》书影	(203)
图 5-1	“意—象—言”关系	(218)
图 5-2	报纸上刊登有关《易经》“坎卦”与杰克曼之死的 报道	(255)
图 6	司马富易学著作封面的书影	(275)
表 3-1	理雅各的《易经》译本体例及内容	(108)
表 3-2	理雅各《师卦》翻译(中英对照)	(111)
表 3-3	理雅各英译《易经》与欧雷蒙编辑的理雅各英译 《易经》的对比表	(142)
表 4-1	中文《乾卦》与蒲乐道《易经》译本中《乾卦》 译文的对照表	(163)
表 4-2	《诗经·邶风·墙有茨》和《易经·蒙卦》句式结构 比较	(173)
表 4-3	卫一贝《乾卦》译文和夏含夷《键卦》译文的爻位 翻译比较	(192)
表 4-4	夏含夷《渐卦》译文	(192)
表 4-5	“乾元亨利贞”的英译表解(部分)	(197)
表 5-1	小说《死与易经》的结构表	(236)
表 5-2	诗歌《一个美国人的〈易经〉之旅》中的“楔子”	(269)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原因、目的和学术价值

《周易》在英语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至今仍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选择“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既具前沿性，又显得十分必要。学界普遍关注西学东渐的问题，而对中（汉）学西传，包括中国典籍的外译、中国典籍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对中国典籍的接受等，尚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近十多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994年成立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于2002年增设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学科组，并定期召开“全国典籍英译研究会”。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典籍英译研究会”已召开七届。其名称于第七届会议上更名为“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此外，2001年，汕头大学建立了“典籍英译研究中心”；2003年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并建立了相关网站。

（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设立了《大中华文库》，旨在翻译中国典籍，其中傅惠生的《易经》译本已于2008年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2011年11月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暨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代表，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再立新功。李长春在讲话中对《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给予高度评价：《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建设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3)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汉籍西译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例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在曹顺庆、赵毅衡、王晓路等学者的悉心指导下，已经相继完成“英语世界的《诗经》研究”“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英语世界的宋词研究”和“法译《文心雕龙》”等系列博士论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翻译绝对不是译者个人译得优劣与否的小事，而是直接关系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重大事件。典籍翻译尤其如此。

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关心的是汉籍西译的问题，而对汉籍传播到西方后的接受情况关注与研究尚少。上面提到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论文，既研究了汉籍在英语文化中的传播，也研究了汉籍传播后的接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只要坚持，不出数年，其成果即会卓著。

对于《易经》，也存在类似问题。国内对海外易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经》的翻译上，成果有“《易经》在法国”（王东亮，1991）、“《易经》在欧洲的传播——兼论理雅各和卫礼贤的《易经》译本”（蓝仁哲，1991）、“《周易》西行——关于《周易》的德译与英译”（凡木，1992）、“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杨宏声，1994）和“试析《周易》英译的失与误”（岳峰，2001），等等。而对《易经》在英语文化中的接受则研究得不多。

本书既关注《周易》在英语文化中的传播（主要为译介），又强调《周易》在英语文化中的接受研究，特别是文学方面的接受研究更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众所周知，国内的易学研究非常发达，近些年来，尤其是出土文物（例如马王堆汉墓的出土）使易学研究飞速发展。英语世界自1876年麦丽芝（Thomas McClatchie）全译《易经》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对《易经》的翻译与研究，马王堆汉墓中帛书《易经》的出土更是让海外易学研究如虎添翼，例如孔理霭（Richard Allen Kunst）和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的博士论文均是在此背景下做出来的。然而，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期刊与著作，试图发现国内学人对海外易学的关注状况，结果并不理想，只有个别著作中的很少篇幅对此问题有所说明，除蓝仁哲（1991）、凡木

(1992)、刑文(1997)、王晓路(2003)、刘正(1990, 2003)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海外易学研究的发展外,国内易学研究对海外的情况几乎不提。这牵涉到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易经》本身抽象深奥,因而用外语(包括英语)来理解《易经》就更具难度;第二,国内学者存在或多或少的优越心理,认为西方人无法理解《易经》,即便能理解,也是浅层理解,无法深入。本书的撰写意在填补学界研究的空白,拓展国内易学研究的视野,这也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毋庸讳言,英语文化中的《易经》研究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国内易学有借鉴意义,例如成中英指出,英语文化中的《易经》研究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充分利用中国国内以及英语文化中的易学成果,可以在十多个领域(比如文史易、哲学易、科学易、逻辑易、语言易、管理易、兵法易、医学易、宗教易、艺术易以及民俗易等)^①展开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从学科研究的广度来说,西方易学研究明显多于国内传统易学研究(义理、象数和易图等)的领域和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易经》在英语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对拓展国内易学的研究视野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概而言之,本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对“《易经》英译史”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填补国内外该项研究的空白。

(2) 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诠释和传播为中心,加深对中华文化价值的认识,从《易经》与世界主要国家文化的相遇、交流和融合之中重新确定《易经》的现代意义。

(3) 推动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易学史的研究。通过评述《易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从而推动海外易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进程,梳理出全面而系统的海外易学史体系。

(4) 加深中国学术界与国外汉学界的学术互动,从而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5) 为今后国家对外文化战略提供历史经验。通过对《易经》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基本规律、

^① 成中英:《国际〈易经〉研究:回顾与展望》,《易学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296页。

基本经验、基本方法,为国家制定全球文化战略和宏观政策做好前期的学术准备和学术论证。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易经》1876年由麦丽芝首次全译为英文以来,各类《易经》英译本已有近百种,英语世界同时也展开对《易经》的学术研究。按研究所侧重的内容来进行分类,其荦荦大者可归结为三类十五项:

第一类偏重文献且以《易经》经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1)《易经》原典研究与《易经》翻译(如 James Legge: 1882; Richard A. Kunst: 1985; Edward L. Shaughnessy: 1983, 1996; Richard J. Lynn: 1994 等);(2)新出土《易经》文献与《易经》的英译和研究(如 Edward L. Shaughnessy: 1996; Haeree Park: 2009 等);(3)对《易经》本身的研究,包括《易经》的编纂(如 Edward L. Shaughnessy: 1983)、《易传》的编纂(如 Edward L. Shaughnessy: 1993)、《易经》与《易纬》的关系(如 Peng-fu Neo: 2000)以及对《易经》爻辞的研究(如 Willard Peterson: 1982),等等。

第二类研究易学理论体系及其相关问题,包括:(4)研究《易经》与科学的关系(如李约瑟: 1956; Fritjof Capra: 1976);(5)研究《易经》的哲学理念(如 Paul Carus: 1896; 成中英: 1977, 1987a, 1987b, 1991, 2003a, 2003b, 2006, 2008; 唐力权: 1974, 1979, 1985, 1986, 1991, 1993, 1994, 1997 等);(6)《易经》与宇宙论研究(如 Thomas McClatchie: 1874; Liou Tse-Koua: 1940; Timothy Phelan: 1982; John B. Henderson: 1984; John Major: 1984; Angus Graham: 1989; Sarah Allen: 1991; Marc Kalinowski: 1991; Richard Smith et al.: 1993; Bent Nielsen: 2003; Richard Smith: 2006, 2008);(7)《易经》与象数研究(如 Bent Nielsen: 2003);(8)《易经》与其他学科类同性研究,如《易经》与卜筮(如 Diana Farrington Hook: 1975, 1980, 1988; Richard J. Smith: 1986, 1987, 1993, 1997, 2004, 2005a, 2005b, 2006; Richard Smith et al.: 1991)、《易经》与心理学研究(如荣格: 1912, 1961, 1968 等);《易经》与同时性研究(synchronicity)(如荣格: 1912, 1960; Wayne McEvilly: 1968; F. D. Peat: 1988; Mark A. Thurston: 1997; Lance

Storm: 1999; Young Woon Ko: 2004)。

第三类研究易学史,讨论历代各家各派易学理论,包括:(9)《易经》与史学研究(如 Richard J. Smith: 1990, 2008, 2009, 2012; Hon Tze-ki: 1992, 2005);(10)《易经》与易学家的研究(如 Paul George Fendos, Jr.: 1988; Hon Tze-ki: 2000, 2002, 2005; Howard L. Goodman: 1985; Larry J. Schulz: 1982; 陈启云, 1968);(11)《易经》的世界传播(如 Paul George Fendos, Jr.: 1999; Benjamin Ng Wai-ming: 1998, 2000; Richard J. Smith: 2005);(12)传教士与《易经》(如 Richard J. Smith: 2001, 2003);(13)《易经》西传文献整理(如 Hellmut Richard: 1975; 成中英等: 1987; Edward Hacker: 2002; Richard J. Smith: 2003, 2009, 2012);(14)《易经》与文学(如 Gu Mingdong: 2003, 2005a, 2005b);(15)对研究中国典籍的外国专家的研究(如 Norman J. Girardot: 2002; Lauren F. Pfister: 1995, 2004a, 2004b, 2005, 2011; Hon Tze-ki: 2005)。

国外还有一大批学者研究《易经》及其相关作品,例如扬雄的《太玄经》、智旭和尚的《易经禅解》等。可以说,凡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都或多或少地接触或研究过《易经》。这正印证了鲍尔(Wolfgang Bauer)的一句话:“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不了解《易经》这本书,那就几乎应该被看作是人精神生活上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①

西方易学研究者中特别突出的有如下一些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贝恩斯(Cary F. Baynes)、布劳菲尔德(John Blofeld)、苏德恺(Kidder Smith)、司马富(Richard Smith)、夏含夷、孔理霭、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茹特(Richard Rutt)、柯汤姆(Thomas Cleary)、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荣格(Carl G. Jung)、亨德森(John B. Henderson)、葛瑞汉(Angus Graham)、葛兰言(Marcel Granet)、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安乐哲(Roger T. Ame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郝大维(David L. Hall),等等。他们或有《易经》译本问世;或有论文或论著问世,广泛讨论各类与《易经》相关的问题。

对于中国典籍传入西方,一般人最先想到的便是翻译,如安乐哲在

^① 这是鲍尔在卫理贤《易经》译本再版序言末尾引用哲学史家 Wayne McEvelly 在《东西方哲学》(1968)一书中的一句话。

《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一书中就有相关的论述：

我们试图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计划性地挑战既有的阐释。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认定中国哲学术语的现行译法往往没有充分尊重既存西方世界观和常识同早期中国文化发生时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西方翻译者一般将最先跃入其脑际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感觉最舒服的词汇视为最贴切的翻译，但这种译法意味着西方人把原本不熟悉的术语未经思索就译出来了。传统的译法将“道”译成“the Way”、“天”译为“Heaven”、“德”译为“Virtue”，这些都是给中文强加上与其无关的文化假设的典型例子。

现存的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英汉语词典和默认一个未经反思的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但这种翻译模式和未经反思的假定一道导致了文化的模糊表达。我们认为，基于这套模式的翻译实际上已经走得太远，有意无意地将一个文本从其历史和人文背景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一片哲学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这是在任意利用该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相反，将文本置于其自身环境中相对保守地加以定位，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亦可心向往之。^①

安乐哲还认为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中国典籍的哲学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被大打折扣；而且他也认为，这种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

我们在重新翻译哲学经典时，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说我们的译文是“自觉自明”的，绝不是说我们的规则已被广泛承认，也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字面的阐释。但是，我们认为坚持要求译文要完全忠实原文不仅是无知的，而且其自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偏见。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作为翻译的

^① [美] 安乐哲著，温海明编：《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